

澳门华商与孙中山的行医及革命活动

林 广 志

摘 要：孙中山早年在澳门的活动，包括进入镜湖医院、开办药局、推广西医，乃至开展革命活动，均与澳门华商有密切关系。由于受葡医、中医的排挤与忌妒，以及在华商中找不到政治运动的“热心同志”，孙中山于 1894 年初带着遗憾离开澳门。辛亥革命后，以卢廉若兄弟为代表的澳门新一代华商对孙的革命伟业有了新的认识，出资出力，甚至加入同盟会或国民党，逐渐转变为革命的“热心同志”。孙中山早期在澳门的活动，推动了近代澳门华人社会的开放与进步。

关键词：孙中山 澳门 华商 镜湖医院 中西药局

孙中山早年在澳门的活动，近年来史学界已有较多研究，出版了一批重要成果。^① 这些研究主要以孙在澳门行医及同盟会的活动为主线，关注澳门经历对孙思想的影响、孙在澳门行医及其家人在澳门生活的情形等。“澳门不仅是孙中山迈向世界的门户和踏进社会的舞台，而且也是孙中山安置家人和从事革命活动，进行救国斗争的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基地”，^② 但由于研究视角与史料匮乏等原因，已有研究对孙在澳门接触和交往的对象——华商缺乏足够关注，或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对华商与孙交往的过程以及双方的心态鲜有论及，无法全面揭示孙早年在澳门活动的历史面貌。本文拟以澳门华商与孙中山围绕推广西医与鼓吹革命的互动为视角，借助新发现的史料，探讨在近代澳门华商崛起的背景下，华商与孙中山的关系，以期推进“孙中山

① 主要有吴伦霓霞、陈胜旻等编：《孙中山在港澳与海外活动事迹》，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香港：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1986年；盛永华、赵文房、张磊编：《孙中山与澳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若昂·哥德斯（João Guedes）：《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文化杂志》（澳门）第17期，1993年；庄政：《孙中山学医及行医述略》，《历史月刊》（台北）第60期，1993年；陈树荣：《孙中山与澳门初探》，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磊、盛永华、霍启昌：《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社会舞台》，澳门：澳门大学，1996年；卡洛斯·高美士·贝萨（Carlos Gomes Bessa）：《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孙逸仙致若塞·卡洛斯·米那总督的一封信》，崔维孝等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年；黄宇和：《孙逸仙澳门行医探索》，《九州学林》（香港）2008年第6卷第2期；金国平：《孙中山与澳门二题》，《澳门研究》2011年第3期；盛永华、张磊主编：《辛亥革命与澳门》，澳门：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2011年，等等。

② 林家有：《香港、澳门对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形成的影响》，《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3页。

与澳门”问题的研究。

一、镜湖医院：“破例”聘用孙中山

鸦片战争前，澳门华人商业处于为葡人服务的附属地位，仅在葡人的对外贸易及生活所需中“稍沾余利”，规模比较弱小。嘉庆年间，“华人在澳开铺落业者，男妇共有三千一百余名口，因夷人止知来往贸易，凡百工所备，均需仰给于华人，而贫民亦可藉此稍沾余利，历久相安，从无争竞”。^① 鸦片战争后，随着香港开埠以及对外贸易的衰落，以鸦片走私、苦力贸易和赌博专营为主要增长点的经济模式取代历时已久的以国际转口贸易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模式，澳门实现首次经济转型。在新形势下，华人与葡人的经济实力出现逆转：华人资本以其独有的本土优势与庞大的市场网络，积极参与赌博、鸦片等各类专营权的竞投与承办，迅速崛起，逐步掌握了澳门的经济命脉。^② 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马瑟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抵达澳门，看到华人商业的繁盛景象，感叹道：“昔日的澳门商业茂盛，一本万利，遐迩闻名，如今却荡然无存……中国人的产业好像正在吞噬所有空间。确实，居民的构成大部分已都是中国的男男女女，他们在葡国人和外国人家庭式的商行中从事最低贱的工作。中国人还开店铺、小作坊和在集市上做生意。”^③ 至1867年，“澳门贸易的关键掌握在华人手中”，澳门“有40家商行（*Hãos*），都是些寄卖店或代理行。这些都是澳门华人贸易最重要的商行。大部分商行，换言之，其中的36家总行设在澳门，在中国、交趾之那、暹罗、新加坡、檳城等地设有分行”。^④

镜湖医院的创建，是近代澳门华商崛起以及华人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1871年10月28日，为解决日益增加的贫困华人就医问题，华人沈旺、曹有、德丰、王六（禄）在澳葡政府公物会注册立约，申请成立华人医院。1872年6月，镜湖医院落成启用。除建筑用地由澳葡政府拨给外，医院建设费用由71位商人、152家商号自愿募集。^⑤ 该院创立后，采用中医中药治疗，逐步发展成为澳门最具规模的华人慈善医院。自1874年起，镜湖医院每年公推12位华商出任总理，早期比较著名的总理有：曹应贤（曹有，1874、1887）、赵允冠（1876）、冯成（1878）、卢华绍（卢焯之、卢九，1879、1906）、何仲殷（何连旺、何穗田，1881）、曹善业（曹子基，1890）、吴节薇（1893）、萧瀛洲（1896、1906、1909）等。^⑥ 这些巨商名绅经济实力雄厚，社会影响巨大，在华葡社会拥有较高地位，与清政府、澳葡政府也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开展医疗和慈善事务外，镜湖医院亦是华商领袖集议办公之所，有关华人事务多在此商议，“一九一一年以前，澳门商人并无团体之设。每遇事故，则假座镜湖医院集

① 《广东巡抚韩崑奏报查阅澳门夷民安谧并酌筹控制事宜前山寨关闸仍旧防守折》，嘉庆十四年二月初五日（1809年3月20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25页。

② 关于近代澳门华商的崛起，参见林广志：《晚清澳门华商的崛起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1册，澳门：澳门基金会，2008年，第223页。

③ 文德泉（Manuel Teixeira）：《一八五四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看到的澳门》，《文化杂志》（澳门）第7—8期，1989年。

④ Manuel de Castro Sampaio, *Os Chins de Macau*, HongKong: Typographia de Noronha e Filhos, 1867, pp. 114-115.

⑤ 参见《创建镜湖医院碑记》，原碑现存澳门镜湖历史纪念馆内。

⑥ 镜湖医院慈善会：《镜湖医院115周年纪念特刊》，1986年，第85—87页。

议解决”。^①

1890年以后，镜湖医院的医疗与慈善业务蓬勃发展。此时，孙中山正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② 读书期间，孙与陈少白、尤列及杨鹤龄交往甚密，并不时来到澳门，驻停于水坑尾杨鹤龄寓所（人称“杨四寇堂”者）。^③ 澳门华商曹善业、何连旺等人凭此便利，曾邀请孙为其家人治病，孙逐渐与澳门绅商熟稔，其医术在澳门已有一定影响。^④ 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以最优异成绩毕业。同年9月，由卢九、何连旺、曹善业、吴节薇等人引荐，并经其本人“屡请”，孙中山为镜湖医院“破例”聘用，“当地有镜湖医院为华人公立，向用中医中药施治贫病，总理屡请其兼用西医西学，以济中医所不及，并愿充当义务，不受薪金，该医院竟破例从之”。^⑤ 孙中山由此成为澳门第一位华人西医。

孙中山到镜湖之后，尽管医术高明，但华人社会“向用中医中药施治贫病”，对孙及其西医学多持怀疑态度。为此，华商领袖不遗余力，以各种方式积极推介孙的人品和医术，其中以何连旺、卢九等人出力尤多。1893年初，前山军民府魏某久患痔疮，“每晨必大解，每大解必卧数时而后起，其苦已甚，其累日深”。何连旺乃力荐孙中山为之诊治，“不过七日之功，其痔遂脱，毫无他害”。魏某顽疾顿除，甚为感激，自7月25日起连续在《镜海丛报》刊登启事，赞誉孙中山医术“神乎其技”。魏某病愈后，“因之家内男女老幼、上下人等亦皆信之不疑”。^⑥ 1893年9、10月，卢焯之、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曹子基等一群自称“乡愚弟”的华商以“春满镜湖”为题，连续在《镜海丛报》刊登广告，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人品和医术：

大国手孙逸仙先生，我华人而业西医者也。性情和厚，学识精明，向从英美名师游，洞窥秘奥，现在镜湖医院赠医数月，甚著功效……今我同人为之厘订规条，著明刻候……一、凡到草堆街中西药局诊症者，无论男女，送医金贰毫，晨早七点钟起至九点钟止；一、凡亲自到仁慈堂右邻写字楼诊症者送医金壹员……^⑦

澳门华商将孙中山推崇为“大国手”，为其厘订诊金规条，让孙中山颇为感慨，认为“此事有大可注意者一端，则自中国有医局以来，其主事之官绅对于西医从未尝为正式之提倡，有之，

① 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中华总商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特刊（1913—2003）》，2003年，第44页。例如，1904年泰隆银号发生挤提风潮，“急请澳中富绅齐聚镜湖医院商议办法”。医院绅董以务实态度，查清泰隆银号家底，裁定“先还一半”，“其息银即于是日止截”。事件平息后，“人皆颂院中诸绅善为调处，于商务大有影响”。（《澳门商务之近闻》，《广东日报》（香港）甲辰年（1904）十二月初五，第2版）

② 《建国方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9页。

③ 参见《兴中会四大寇订交始末》，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9页。

④ 参见《澳门之医业》，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广州：岭南大学，1935年，第17页。

⑤ 《孙总理之医术》，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9页。按：究竟是谁引荐孙中山进入镜湖，说法不一：或说是吴节薇，或说是何连旺，或说是曹善业。笔者认为，卢九、何连旺、曹善业、吴节薇等人为当时知名绅商，分别于1879、1881、1890、1893年任镜湖医院总理，均在1892年前后参与镜湖医院的管理工作，且对孙中山的医术人品早有认识。因此，他们一起或分别向镜湖医院绅董推荐孙中山，较有可能。也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在香港法院认识的好友、葡人飞南第也参与了推荐。（参见卡洛斯·高美士·贝萨：《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孙逸仙致若塞·卡洛斯·米那总督的一封信》，第17页）

⑥ 《神乎其技》，*Echo Macaense*, Julho 25, 1893.

⑦ 《春满镜湖》，*Echo Macaense*, Setembro 26, 1893.

自澳门始”。^① 经卢九、何连旺等人大力推广，孙中山乃声名大振，慕名病患日多，其医务迅速发展。至1893年9月间，孙中山已开设镜湖医院西医局、草堆街中西药局、“仁慈堂右邻写字楼”医馆等门诊与药房，异常忙碌。^② 陈少白对孙中山医务的发展速度也颇感惊讶：“很奇怪不满两三月，声名鹊起，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耳闻其名，极端钦佩的，就诊者户限为穿。”^③ 多年之后，孙中山仍对华商在其医务上所给予的协助满怀感激：“予既卜居于澳门，澳门中国医局（指镜湖医院——引者注）之华董所以提携而嘘拂之者无所不至，除给予医室及病房外，更为予购置药材及器械于伦敦。”^④ 在共同推广西医的过程中，孙中山与华商“时相往还，友谊日笃”。^⑤ 这种经历与交情，为日后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时继续得到澳门华商的支持打下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读书期间往来澳门，乃至到镜湖坐诊赠药，充分利用了他的地缘优势，其主要的交往与支持者，多为广东、特别是香山籍华商，包括顺德籍的何连旺、新会籍的卢九以及香山籍的郑观应、曹有、杨鹤龄、黄咏商、曹善业、吴节薇、陈赓虞、陈席儒、萧瀛洲等。^⑥ 其中，郑观应、杨鹤龄、黄咏商、曹善业、何连旺、吴节薇、陈赓虞被冯自由誉为兴中会初期孙中山的“友好及同志”，^⑦ 而吴节薇、何连旺，以及镜湖医院创始人、香山籍的曹有、曹善业父子，对孙中山开创中西药局曾给予大力支持。

二、曹有父子：支持孙中山“开创”中西药局

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席不久，1892年12月18日，孙中山为拓展医务，托吴节薇担保，向镜湖医院揭“本银贰千大员”，折银“壹千四百四拾两正”，“订议在澳门大街开创中西药店一间”，所借款项，用于“寄办西国药料”，“自愿赠医不受谢步”。此次借款，“限用五年为期，到

① 《伦敦被难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0页。

② 参见《春满镜湖》，*Echo Macaense*, Setembro 26, 1893.

③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7页。

④ 《伦敦被难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页。

⑤ 《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72页。

⑥ “何连旺，广州顺德人，其隶西洋籍之名曰廷光，赏有宝星，赐有荣衔，西洋人多以亚旺呼之”；何氏“尝资助总理在澳门设立中西医局行医”。（参见《镜海丛报》1894年9月26日，第10号、《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5页）黄咏商为兴中会会员，“粤之香山人，世居澳门……广州重阳之役，咏商鬻其苏杭街洋楼一所，以充军费，得资八千元。及败挫，诸领袖多亡命海外，咏商独匿居澳门，未几以病去世”。（《黄咏商略历》，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6页）吴节薇，又名吴文坚，香山籍商人吴昌之子。1893年任镜湖医院总理，1901年加入葡籍，1909年为澳门“纳公钞至多之人”之一。（镜湖医院慈善会：《镜湖医院115周年纪念特刊》，第86页；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以下简称《澳门宪报》）1901年1月12日，第2号、1909年5月15日，第20号，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年）陈赓虞，香山籍著名华商陈芳长子，在澳门从商。其弟陈席儒，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回国后在港澳两地经商，曾出巨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15年任镜湖医院总理。（参见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9页）萧瀛洲，又名萧登、萧壮宗、亚登，香山籍商人萧五之子。主要经营赌博、鸦片及银号。1896年任镜湖医院总理，1913、1914、1922、1923年任澳门商会（澳门中华总商会前身）一、二、十、十一届总理。（镜湖医院慈善会：《镜湖医院115周年纪念特刊》，第86页；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中华总商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特刊（1913—2003）》，第92页）

⑦ 参见《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3—7、20页。

期如数清还；或过期不测，无力填还，担保人吴节薇兄自愿填足，毋得异论”。签约时，“知见人”为黎若彭、阮建堂、黎晓生、曹渭泉、张桢伯、宋子衡等六人。^① 1893年4月22日，孙中山因“在澳草堆街开设中西药局壹间”，“需银应用”，再次由吴节薇担保，向镜湖医院益善堂“揭到”本银“贰千四百大员”，“知见人”为何穗田、罗澄波。^②

在上述华商以及镜湖医院的支持下，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中西药局终于在7月底“开市”。自1893年8月1日起至1894年1月31日，中西药局连续以“中西圣药”为题，在《镜海丛报》刊登19次“启事”，声明“本局拣选中西地道良药，各按中西制法分配成方……所制西药，早已功效昭昭，遍闻远近，无烦赘述焉。中西各药，取价从廉，已于十七日开市”。^③

关于中西药局的原址，历来说法多有出入。“揭本生息赠药单”显示，中西药店开在“澳门大街”。孙中山第二次借款时，其“揭银单”声称“在澳草堆街开设中西药局”，卢焯之等人所刊广告“春满镜湖”也称“草堆街中西药局”，但均未注明门牌号码。冯自由称“孙设中西药房于澳门康公庙前”，^④ 张磊等学者则明确指出“中西药局设于澳门草堆街80号”。^⑤ 2006年7月28日，黄宇和到草堆街实地考察，根据该街78号东主熊永华口述，认为中西药局“可能是80号”。^⑥ 不过，由于没有确切的文献佐证，学者们关于“中西药局原址在草堆街80号”的结论，无法令人信服。那么，孙中山创办中西药局时，究竟是谁为之提供药局“店铺”？现存草堆街80号，究竟是不是中西药局原址？

笔者认为，此问题的解决，必须从与孙中山密切交往的华商及其相关活动入手。孙为开创中西药局，两次从镜湖医院借款，均得到吴节薇、曹有、何连旺等人的支持与帮助。同样，中西药局所用的房屋，或租或借，也应与上述华商有关。因此，如果能够查实当时草堆街80号的业主姓名，明析他与孙有何关系，他对孙的医务持何态度，或许可以确认中西药局的原址。

1846年5月29日，澳葡总督亚马勒（Ferreira do Amaral）宣布，“从本日起，所有铺户、杂货店无论是固定的，还是流动的，都必须得到许可方可营业”。^⑦ 这是澳葡政府褫夺华人商铺经营管辖权的最早记录。1847年7月14日，亚马勒为向华人征税，又宣布对华人商铺进行编号登记。^⑧

① 《揭本生息赠药单》，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6—7页。按：六位知见人均为著名富绅，其中，黎若彭、黎晓生、张桢（贞）伯三人于1892年镜湖医院总理。（参见镜湖医院慈善会：《镜湖医院115周年纪念特刊》，第86页）孙中山此次借款，确实未能“如数清还”。据吴节薇回忆，“孙中山先生借了二千元，把钱（投）在草堆街开设中西药局，而借钱所纳利息，是用来购买西药赠给穷人的……直至借款五年的日期告满，我便代孙中山先生还了二千元，另外三百元利息”。（《吴节薇讲述孙中山先生在澳行医情形》，《大众报》（澳门）1956年11月14日，第1版）

② 孙中山于1919年10月30日归还了此笔借款，镜湖医院将“此银收妥后即将揭单交还孙逸仙先生收回”，并开具收据。该《揭银单》、《计数闲单存据》现存澳门镜湖历史纪念馆内。（另见盛永华、张磊主编：《辛亥革命与澳门》，澳门：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2011年，第48页）

③ 《中西圣药》，*Echo Macaense*, Agosto 1, 1893, Janeiro 31, 1894. 按：黄宇和将“十七日”折算为阳历7月29日，认为“中西药局似乎迟至1893年7月29日才终于开业”。参见黄宇和：《孙逸仙澳门行医探索》，《九州学林》（香港）2008年第6卷第2期。

④ 《尤列事略补述一》，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31页。

⑤ 张磊、盛永华、霍启昌：《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社会舞台》，第156页。

⑥ 黄宇和：《孙逸仙澳门行医探索》，《九州学林》（香港）2008年第6卷第2期。

⑦ *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Timor e Solor*, 4 de Junho de 1846. 转引自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4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7页。

⑧ Lia Arez Ferreira do Amaral, *O Significado do Governo de Ferreira do Amaral em Macau (1846-1849)*, pp. 7-8. 转引自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4卷，第1628页。

从此，所有华人物业均须登记造册，受到澳葡政府的“法律保护”。因此，如果能够找到1892—1893年间草堆街80号屋在政府部门登记的册簿，便可知此屋的业主、方位与结构，并借此考证其业主与孙中山的关系，推断此屋是否为中西药局原址。

现存《澳门宪报》记载了近代澳门华人物业登记、转移的大量信息。该报1908年2月29日第9号附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文告”：

照得曹善根即善根，曹善麟即善麟，均已娶，居澳，业主，前到案控告曹善业即曹子基，已娶，住澳，业主，欠银一案。经将后开各屋查封。兹定于西三月二十三日即华二月二十一日十二点钟在本署将该各屋按照估价出投招买，价高者得。计开：……草堆街第八十号屋，注册五百二十三号第三号B簿第一百五十五页后幅，估价银五千元为底……^①

这则“文告”提供了1908年间“草堆街第八十号屋”的业主姓名、登记册簿以及房屋动态、拍卖估价等重要信息：（1）草堆街第八十号屋，业主为曹善业，又名曹子基，因“欠银”一案，被债主曹善根、曹善麟控告而被查封拍卖；（2）该屋注册号簿为“五百二十三号第三号B簿第一百五十五页后幅”；（3）此屋价值颇高，“估价银五千元为底”，应是一间“大屋”。

上述涉讼者曹善业、曹善根、曹善麟均为昆仲，其父为著名绅商曹有。曹有，字应贤，号渭泉、益昌，又称曹存善堂、曹连益堂。据其孙曹克安称，“我的先祖，原籍中山县，后来移居澳门。我的祖父曹应贤，献身为澳门侨胞服务，兴办医院，及各种慈善机构。他是澳门侨胞中获葡皇授勋之第一人。在一八八零年，光绪六年，祖父祖母，接受清政府钦赐，二品顶戴花翎之赏，同时御赐牌匾一面”。^②曹有拥有资财和声望，参与创建镜湖医院后，又于1874、1887年担任该院总理。^③对中西药局的开创和经营，曹有除了协助孙中山向镜湖医院“揭银”外，也曾在资金上予以支持。资料显示，围绕中西药局，曹有与孙中山曾有钱银往来。1896年9月21日，曹有在香港高等法院立下遗嘱，“将所有财产物业特分三股，如下所述分配……另股份及揭项永年息收者列下——……孙逸仙药局一百四十四两”。^④曹有立遗嘱时，孙中山已离开澳门二年有余，该款仍列为“揭项”挂账，并作为遗产分配，显然为中西药局未归还之借款。

曹有育有儿子多人，其中，三子曹善业，又名曹子基，擅长经营，勇于任事，曾于1890年任镜湖医院总理。^⑤如上所述，曹善业是孙中山的“友好及同志”，是孙中山医务的热情支持者，“及先生（指孙中山——引者注）毕业，曹（子基）何（穗田）与港绅陈赓虞，资助先生在澳门组织中西药局，挂牌行医”。^⑥冯自由也指出，曹善业“尝资助总理在澳门设立中西医局行医”；^⑦

① 《澳门宪报》1908年2月29日，第9号附报。

② 曹克安：《家居香港九十年》，台北：星岛出版社，1986年，第2页。按：曹有于1880年6月17日获葡萄牙王室授勋。（参见《澳门宪报》1880年8月7日，第32号）

③ 镜湖医院慈善会：《镜湖医院115周年纪念特刊》，第85—86页。

④ 镜湖医院慈善会：《纪念辛亥革命 弘扬中山精神——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特刊》，2011年，第39页。按：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孙中山将草堆街80号之“租金”折成“揭项”待还。该资料承蒙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黄文辉先生惠告，特此鸣谢！

⑤ 曹善业为澳门近代著名华商之一，热衷于政治及社会活动，曾先后任澳葡政府迎接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董事（1891）、公钞局替理（1894）、公钞局书吏（1895、1896）、理商局局员（1894、1896、1897、1898）、业钞公会正会员（1902）等职。（参见《澳门宪报》1891年4月2日，第14号、1894年1月6日，第1号、1894年8月11日，第32号、1895年1月5日，第1号、1896年1月11日，第1号、1896年6月13日，第24号、1897年12月18日，第51号、1898年3月26日，第13号、1902年2月22日，第8号）

⑥ 《澳门之医业》，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第17页。

⑦ 《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5页。

又曾与卢九等人在《镜海丛报》宣传孙中山的人品医术。^①此外，受父兄影响，曹有的另一儿子曹善允，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也曾暗中相助。据曹克安称，“我父亲（曹善允）对于革命工作，暗助良多。（孙中山）在一八九七年抵达日本。同年陈少白先生，往日本参加在当处举行之兴中会会议。同年我父亲不知甚么缘故，也到日本一行”。^②

曹有以营造、收购等方式，拥有大量房产，而且长期持有经营，历经二十余年。1896年12月，曹有逝世，其家业，特别是房产，交由曹善业管理：“案据曹有即曹清泉，又即曹应贤，又即曹益昌，业已身故，所有遗下产业，经已开列立案。其开列立案者，乃系其总理产业之头人曹善业。”^③另据曹善业于1905年9月2日称，“窃善业所得存善堂物业，向系生父清泉管理，曾经当官喊冷（拍卖）买入屋宇多间，递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清泉公去世，该嘱书内特嘱将存善堂尽交与善业管业收租。除先君二十余年及业手内十年，前后共三十余年，输税纳钞管业无异”。^④曹氏家族于甲辰年（1904）刊印《曹永荣堂业钞册》，上载“曹善业翁名下纳各一业钞纸”，其中，“存善堂”列有“草堆街80号”及其纳税数额，该屋时纳屋税、街灯、印花等税费合计26.35元。^⑤从以上曹有持有的房产及其继承情况来看，可以断定，自1892年起，草堆街80号为曹有的物业，曹有逝世后，由曹善业“输税纳钞管业”，直至1908年2月29日被查封拍卖。

可见，在1892—1893年间，即孙中山开办中西药局时，“草堆街第八十号屋”为曹有所有。为支持孙中山的赠药善举，曹有、曹善业父子作为孙中山的“乡里”及其西医的支持者，除了“知见”孙中山“揭银”外，还将草堆街80号提供给孙中山作为居住与赠医之场所，并给予资金支持，由此见证和参与了中西药局的筹款、选址及开办。^⑥现存草堆街80号房屋，楼高三层，进深28米，属粤式上居下铺建筑。根据该房屋的格局与功能，葡籍学者高美士认为，孙中山当年乃将住所和诊所设在草堆街，“在他一生中，这是个极其动荡的时期，孙中山必须数次居住于澳门。他将住所（residência）和诊所（consultório）设在草堆街（Rua das Estalagens）”。^⑦

三、孙中山：“时欲物色热心同志”而“杳不可得”

在上述华商的支持下，孙中山的医务似乎颇为顺遂，他在药局诊症，在街外赠药，非常忙碌，诊金收入也颇为可观，“他这一年的医金收入计算一下，竟有一万元之多”。^⑧然而，1894

① 《春满镜湖》，*Echo Macaense*，Setembro 26, 1893.

② 曹克安：《家居香港九十年》，第2页。

③ 《澳门宪报》1896年12月26日，第52号。

④ 《澳门宪报》1905年9月2日，第35号。按：曹有逝世后，其房产除了曹善业掌控之外，也有一部分陆续分至各子名下。参见《澳门宪报》1907年11月23日，第47号。

⑤ 参见镜湖医院慈善会：《纪念辛亥革命 弘扬中山精神——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特刊》，第40页。

⑥ 2010年5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成立“中西药局关注小组”。9月18日，邀请专家、学者及相关社会团体负责人召开“草堆街八十号论证会”。2011年7月22日，特区政府乃斥资3600万澳元收购了该房屋。据悉，文化局拟按澳门传统药房的格局，将该房屋规划修葺为孙中山在澳门事迹展览馆。《政府3600万收购草堆街80号》，《澳门日报》2011年7月23日，A1版。

⑦ Luís Gonzaga Gomes, *Curiosidades de Macau Antiga*, 2.ª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 pp. 172-175.

⑧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第27页。

年1月前后,声誉日隆的孙医师却带着遗憾离开澳门。^①

关于孙中山离开澳门的原因,一般解释为受澳门葡萄牙同行的排斥,而这一原因,源自孙中山自述:

盖葡人定律,凡行医于葡境内者必须持有葡国文凭,澳门葡医以此相齟齬,始则禁阻余不得为葡人治病,继则饬令药房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不得为之配合。以是之故,而予之医业之进行猝遭顿挫,虽极力运动,终归无效。顾予赴澳之初,并不料其有是,资本损失为数不少,旋即迁徙至广州焉。^②

冯自由也称,“孙总理……因营业日盛,大招葡国医生所忌。澳门例,非在葡政府取得行医执照,不得在当地操业。总理受葡医所排,遂不能在澳门立足,旋复设东西药局于广州冼基”。^③当代学者也普遍认为,孙中山“受澳门葡籍医生排挤,改赴广州行医”。^④据此,孙中山“受葡医排斥而离澳”,似成定论。

然而,1893年12月19日《镜海丛报》刊登的《照译西论》,披露了镜湖医院存在的某些问题,该院部分司事、值事和医生“殊失公道”,“忌妒”孙中山,孙在镜湖“独立难支”的窘况随之浮现出来。该评论指出:“若镜湖医院者,实无益于贫病,而徒有其名者也。”据称,镜湖医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1)“医生不得其人”,医疗水平欠佳,“今该院之中国医生,扣其学则无有,考其出处则卖菜担水者或亦有之,其席位则三月一易”。而且医生的聘请,不经考试,只靠人情关系,“其请医则不计其能医人与否,惟视推荐值事情面而定弃取”;(2)医院值事缺乏“怜悯之心”,连病人的收治,也要看值事的“情面”,“病人之进院,不计其症应否入院方能医治,医生固不晓何等病症应进院,何等不应进院,其司事则体值事之情面所荐,如无值事荐入,虽危急亦不收;有人荐,则不病亦收以养之”;(3)排挤西医,特别是疑忌“春满镜湖”的西医孙中山。引入西医,中西兼施,于医院本是大好事,“该院惟自孙医生入内,自筹经费,开创西医局,益人甚多。初时每日街症百余人,后以经费不多,则限赠五十人之药。又遇有大症,则收入院内医治,如砂淋、肉瘤等症割愈甚多,此皆为从前所未有,若永远如此办法,岂不甚善”?但是,孙中山的这种“善举”以及受欢迎的程度,最终“为该院司事、医生、值事等所忌……停办,殊为可惜。今街外赠诊,该院亦尽委之于孙医,因而现时经费,概由孙医捐资独办,颇有端倪,但独立难支……夫医院每日只医十数人,而一年开销六七千元经费。今西医局每日医百数十人,其功十倍,乃令一人担待其任,亦殊失公道矣”。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作者认为,“其法有四”,其中,经费方面必须向西医倾斜,“院内经费当分一半,以给西医经费”。否则,镜湖医院“使有为善之名而无为善之实,则不如勿设,以省无益之资矣”。^⑤

根据此篇评论,费成康认为,“葡籍医生的排挤,只构成孙中山离开澳门的部分原因,而与

① 费成康根据中西药局最后一次刊登广告的日子,推断“孙中山离开澳门的时间当在一八九四年一月前后”,因此,“孙中山在澳门的行医生涯长达一年多时间”。(费成康:《孙中山和〈镜海丛报〉》,《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② 《伦敦被难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页。

③ 《孙总理行医广告》,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6—7页。按:史扶邻(Harold Z. Schiffrin)称,真正的原因可能是香港、澳门政府之间缺乏学历互认机制,正如持有葡萄牙和其他外国学历证书者不能在香港执业一样,澳门政府也没有义务承认英国的医学学历。(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 32)

④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

⑤ 《照译西论》,《镜海丛报》1893年12月19日,第23号。

镜湖医院有关人士的冲突当是他离去的又一重原因”。^① 李长森也认为，孙中山将离澳的原因归咎于“行医于葡境内者必须持有葡国文凭”的规定以及澳门葡医“饬令药方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不得为之配合”，而绝口不提镜湖医院的经历，“可能是由于他以大局为重，将与医院的关系视为个人或者华人之间的恩怨，不愿将其公布于众而已”。^②

此篇评论，可信度如何？姜义华认为，“该文的原文是葡文，其作者当是孙中山的葡萄牙朋友。文章的部分内容，如整顿该医院的四条措施等，很可能由孙中山提供。而该文的译者也可能是孙中山本人，他和作者可以英语为工作语言”。^③ 笔者认为，不管该文的实际作者和译者是谁，从当时澳门的医务环境以及孙的医务发展来看，评论所述确实道出了孙在镜湖乃至澳门的困境：孙中山在澳门推行西医，触动了传统中医的利益，遭到镜湖医院部分人士忌妒。尽管早在17世纪，西方医学便已传入澳门，但并没有建立完善、持续的西医医疗服务体系，西医市场颇为“冷淡”，而传统中医则有着深厚的基础，为包括葡人在内的居民广泛接受。“实际上，在十九世纪，西医和药剂师不多，而且主要都是为驻军服务的。城中的豪门大户仍然接受中医治疗。”^④ 至19世纪上半叶，连土生葡人也热衷于看中医，“找中医看病的主要是葡裔的葡萄牙人家庭。因此，它是澳门最好的医疗。同时，偶尔有葡萄牙和外国医生”。^⑤ 据澳葡政府统计，1867年，澳门有中医师104人，中药师52人，草药商42人，西药房则为零，至1896年，仅中医师就有114人。可见，中医是澳门医务市场的主流，相当盛行。到20世纪初，“当阿维罗的医生黎登（António do Nascimento Leitão）于1907年抵达澳门之时，西医仍旧不为人们所信任……的确，当时葡萄牙医生仍无法与具有千年医术历史的中医抗衡”。^⑥ 镜湖医院既然“向用中医中药施治贫病”，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成为澳门中医菁华之所在，可谓澳门“最好的医疗”。在中医中药广受中葡居民欢迎的氛围中，孙为了进入镜湖医院，实在有点“委曲求全”：尽管有镜湖医院资深绅董卢九、何连旺等人推荐，并经其本人“屡请”，而且声明“充当义务，不受薪金”，医院才“破例从之”。没料到的是，孙中山到镜湖医院后，“由是中外人士多就总理诊治，莫不著手成春，称为国手”。^⑦ 可以设想，一个刚刚毕业、初到澳门的年轻华人西医，竟然被称为“国手”，而且病患盈门，“户限为穿”，这对已经处于弱势的葡籍医生固然构成巨大威胁，正如孙中山所述，“予既任事于医局，求治者颇众，而尤以外科为繁。然亚东之闭塞，甫见开通，而欧西之妒焰已起而相迫”；^⑧ 同时，对镜湖医院乃至澳门的中医，在医务及心理上，也不啻是一种巨

① 费成康：《孙中山和〈镜海丛报〉》，《镜海丛报》，第6页。

② 李长森：《明清时期澳门土生葡人的形成发展与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08页。

③ 姜义华：《〈镜海丛报〉序》，《镜海丛报》，第5页。

④ 阿马罗（Ana Maria Amaro）：《澳门医学：名医、药房、流行病及医务治疗》，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3册，澳门：澳门基金会，2009年，第991页。

⑤ 1828年澳葡总督边度（Adrião Acácio da Silveira Pinto）发给里斯本的报告。Mss. do Arquivo Histórico Ultramarino（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手稿）。转引自阿马罗：《澳门医学：名医、药房、流行病及医务治疗》，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3册，第991页。按：边度于澳葡总督的任期为1837年2月22日至1843年。（参见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姚京明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年，第314页）因此，笔者怀疑“1828年”当为1838年之误。

⑥ 阿马罗：《澳门医学：名医、药房、流行病及医务治疗》，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3册，第998、991页。

⑦ 《孙总理之医术》，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9页。

⑧ 《伦敦被难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页。

大的冲击与压力。因此，孙中山招来葡医以及中医的排挤、忌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评论者还指出，正由于镜湖医院存在上述问题，“所以澳中善士，又多立一同善堂以医人，职此故也”。^① 同日出版的《镜海丛报》葡文版所载此篇评论的“引语”更是明确指出，同善堂的设立，是“为贫困阶层提供镜湖医院不能提供的医疗服务”，^② 因为镜湖医院的现状，“与我们华人同胞（concidadaos）中那些心胸宽广、好善乐施者的初衷相牴牾”，因此，“我等听闻数名华籍要人对其批评不绝于耳，且对其司理多有诟病。日前，我等曾目睹议事亭前地隆重开张了一间新的慈善机构——同善堂（Tum-Sin-Tong）。该机构的设立，几与镜湖医院（Hospital China）分庭抗礼”。^③ 显然，镜湖绅董乃至华商领袖之间，在镜湖医院的内部管理以及如何对待孙中山及其医务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孙中山在镜湖的处境颇为艰难。

不过，笔者认为，除了受到葡医、中医的排挤和忌妒外，孙中山离开澳门，还有另一层重要原因：澳门华商对其“改造中国”的理想过于冷淡，孙中山在澳门找不到志同道合的“热心同志”。据孙中山自述，他的“政治生涯”始于1892年在澳门行医时，“时在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予卜居于珠江江口之澳门，以医为业，藐兹一身……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实始于是年；予之以奔走国事，而使姓名喧腾于英人之口，实始于是地”。^④ 他到澳门行医，显然不仅仅是为悬壶济世。早在读书期间，在一次从香港到澳门的旅途上，他曾在香山轮船栏杆旁对陈少白说了一番话，“讲到将来有机会的时候，预备怎样造反”。^⑤ 既到澳门，孙中山乃“借医术为入世之媒”，以镜湖医院为切入点，物色从事政治运动的“热心同志”，“因诤知镜湖医院为全澳有名绅商所公立，向用中药施治贫病。若从事政治运动，非先向该院绅商入手不可”。^⑥ 众所周知，孙中山、陈少白、尤列经常聚于水坑尾杨鹤龄寓所，谈论时政，“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

① 《照译西论》，《镜海丛报》1893年12月19日，第23号。按：据《创建濠镜同善堂碑序》，创建值事有340位（间）商人和商号，曹子基、何穗田、卢焯之、萧瀛洲、吴节薇等与孙中山交往密切，且支持孙中山医务的华商均参与了同善堂的创建。（参见陈树荣主编：《同善堂一百周年特刊》，澳门：同善堂值理会，1992年，第97页）

②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第275页。

③ “Hospital China de Macau,” *Echo Macaense*, 19 de Dezembro de 1893. 按：档案显示，同善堂最初的地址在议事亭前地14号。1892年12月1日，卢九等人递交的禀文称，“窃董等设一公会，捐助集资，购买旧屋一间，座落议事亭前地门牌十四号，现今改建重新，名曰同善堂，以为宣讲圣谕，赠医送书，捡拾字纸等事”。（澳葡政府民政厅档案：A0717 AH/AC/P-1275，澳门历史档案馆藏）关于“仁慈堂右邻写字楼”之孙医馆是否在14号同善堂内，学界仍有较大争议。庄政认为，孙医馆设在“议事亭前地十四号”；（庄政：《孙中山学医及行医述略》，《历史月刊》（台北）第60期，1993年）张磊等学者也认为，“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每日下午1时至3时在位于议事堂前地，仁慈堂右邻的同善堂写字楼诊症”；（张磊、盛永华、霍启昌：《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社会舞台》，第164页）黄宇和则认为，孙医馆设在议事亭前地16A号。（黄宇和：《孙逸仙澳门行医探索》，《九州学林》（香港）2008年第6卷第2期）

④ 《伦敦被难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9—50页。

⑤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第29页。

⑥ 《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72—73页。按：据孙中山自述，“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建国方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9页）葡国学者也指出，孙中山“也许是为了更好地维持生计，他决定开办肺病治疗所并在草堆街开设药局。这两个地方虽说是为病人服务的，但也是革命党人的活动据点”。（若昂·哥德斯：《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文化杂志》（澳门）第17期，1993年）但如要断定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具有明确的革命思想，且一边行医，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仍需寻找新的证据。

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① 时已结识孙中山的卢九、吴节薇、何连旺等人，对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之言论”，应该时有所闻，但能否被孙中山引为“同道”，却是另一回事。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卢九、吴节薇、何连旺以及萧瀛洲等人对孙中山的政治抱负及其“政治言论”反应冷淡。华人绅商的这种态度，让孙中山颇为失望，以致对卢九诸人“不敢引为知己”。据冯自由称：

就中绅商之具有声望势力者，只何穗田、卢九、吴节薇、陈席儒、陈庚如（虞）、萧瀛洲数人。卢、萧二氏为烟赌巨商，向以交结中外官宦为光耀，最称顽固。二陈为檀香山大农业家陈芳之子，稍具洋化而乏远见。穗田节薇思想较新，可作政治谈友。穗田尤热心爱国，惟不赞成激烈之主张。总理所认为好友而时得其助力者，即此何吴二氏耳。总理居澳半载，时欲物色热心同志如郑士良陈少白其人者，杳不可得。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遂有易地广州另创门面之意”。^② 可见，卢九等人在政治上或“顽固”，或“乏远见”，何连旺虽然可作“政治谈友”，却不赞成“激烈之主张”，孙中山欲在澳门寻觅“热心同志”，自然是“杳不可得”。“虽然，澳门是一个自由的地方，但孙逸仙却认为就开展政治运动来说，在这里遇到了很多困难。此外，当地很少政党可以被拉拢”。^③ 这种情形，诚如冯自由所言，“惟当时澳地民智尚极闭塞，居民多不相信泰西医学，欲使移风易俗，已属非易，更未便向之商讨国是”。^④ 就以“政治运动”为目的，对澳门华商抱有颇高期望的孙中山而言，这种政治上的“失望”与“孤单”，也许要超过他在医务上所受到的排挤和忌妒。

总之，由于医务上遭受“顿挫”，政治上颇感“孤独”，孙中山最终还是离开了澳门，“那里缺乏政治活动的良好条件，他（孙中山）深感难以寻求志同道合者，加之受到葡萄牙同行的排斥，致使医业‘猝遭顿挫’。因此，他决定到广州去”。^⑤

四、卢九父子：“最称顽固”与鼎力襄助

1893年2月，孙中山在镜湖医院期间，一群华商另立了一间慈善机构——同善堂，而领头创建者，正是著名赌商卢九。^⑥ 孙中山与卢九父子关系密切，他在澳门时，乃至民国后，无论是行医实践，还是政治运动，甚至家庭事务，都得到了卢九父子的支持和帮助。

卢九（1848—1907），名华绍，字育诺，号焯之，又名卢华富，广东新会潮连人。据《卢氏族谱》称，卢九“少失怙恃，生计殊窘。弱冠后，始至澳门，业钱银找换。稍有蓄积，设宝行钱号。既而以善营商业，雄财一方”。^⑦ 卢九早于1879年便任镜湖医院总理，为该院资深绅董。

① 《建国方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9页。

② 《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73页。

③ 卡洛斯·高美士·贝萨：《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孙逸仙致若塞·卡洛斯·米那总督的一封信》，第18页。

④ 《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72页。

⑤ 张磊、盛永华、霍启昌：《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社会舞台》，第35页。

⑥ 1892年12月1日，卢九、关蕙田、何连旺、王岐卿等46人向澳葡总督递交创建同善堂的禀文；1893年2月25日，澳葡政府批准设立同善堂。（澳葡政府民政厅档案：A0717 AH/AC/P-1275，澳门历史档案馆藏）

⑦ 卢子骏增修：《新会潮连芦鞭卢氏族谱》卷24《家传谱》，“二十世焯之公”，1947年修订，1950年铅印本，第21页。按：卢九家族除了宝行银号“业钱银找换”外，主要涉足赌博经营，是近代澳门著名赌商家族。关于卢九及其家族事迹，参见林广志：《晚清澳门华人巨商卢九家族事迹考述》，《澳门研究》

在医务上,卢九是孙中山推行西医的坚定支持者:出于对孙中山人品医术的肯定,他是孙中山进入镜湖医院的引荐者之一。据《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记载,孙进入镜湖,是卢九“挽其留澳”,“光绪十八年,澳绅张心湖太夫人疾,聘西医孙逸仙博士来澳诊治,已而药到回春,神乎其术。于是,荣禄公(卢九)挽其留澳,荐以镜湖医院医席,为镜湖西医之首任”;^①卢九自称“乡愚弟”,多次带头在《镜海丛报》刊登广告,积极宣传孙的人品医术,协助孙诊症赠药;^②如上所述,卢九领头创建“赠医送书”的同善堂,显然是对镜湖医院部分人士对孙及其西医“殊失公道”而作的抵制。政治上,卢九虽然“最称顽固”,无法成为孙中山的“热心同志”,但在关键时刻,他对孙的革命活动还是给予了帮助。1895年10月,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被清政府通缉,乃在香山人唐雄的帮助下,^③寻机逃出广州,“后幸得达一小汽船,乘之以走澳门。在澳门留二十四小时”。^④在此危急之际,卢九以其在省澳的影响和势力,与葡人飞南第一道,向孙中山伸出了援手:“孙博士之居澳也……不久,闻于清廷,下通缉令,事颇急,荣禄公商于葡籍友人飞若瑟(飞二)者,以船护至香港,转神户焉。”^⑤

卢九育有17子。^⑥与卢九不同的是,对于孙的政治运动,其长子卢廉若、次子卢焯仲、三子卢怡若、四子卢兴原或暗中保护,或捐助资金,或矢志追随,甚至加入同盟会或国民党,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和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成为孙中山的“热心同志”。^⑦

卢廉若(1878—1927),名鸿翔,字圣管,号廉若,又名光灿,生于广东新会潮连。及长,至澳门,随父经营银号、烟赌,遂成巨富。卢廉若长期担任镜湖医院、澳门商会的总理,与历任澳葡总督熟稔,交游广泛。^⑧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卢廉若的政治态度也随之转变:“他

① 第36期,2006年。

① 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1959年,不著页码,未刊稿。按:1959年,“革命老人”卢怡若年届77岁,早年的革命追随者以口述作传方式为之贺寿。此稿为亲历者口述之作,系澳门华商参与和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史料。2007年8月,卢怡若孙女卢美颜将此稿电子版赠予笔者,特此致谢!

② 《春满镜湖》, *Echo Macaense*, Setembro 26, 1893.

③ 唐雄为孙中山的“友好及同志”,“以前曾与总理在檀岛教会小学同视,后偕总理在香港同日受耶教洗礼”。(《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15页)其详细事迹,参见金英杰:《战后萧条经济似死水,升平旅店开赌救市》,《新报》(澳门)2006年8月24日,A06版。

④ 《伦敦被难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页。

⑤ 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按:飞若瑟,即飞南第(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rnandes, 1863-1923),出生于著名的土生葡人家族,其祖父为维森特·若瑟·飞南第(Vicente José Fernandes),其父尼古拉·托伦第诺·飞南第(Nicolau Tolentino Fernandes)。在澳门利宵中学毕业后,往香港发展,利用语言优势,进入港英高等法院任翻译员,在法庭上结识孙中山。1893年回到澳门,投身报业,先后创办中葡文版《镜海丛报》(*Echo Macaense*)。1919年7月考入澳葡政府华务司译务处。(参见李长森:《卢九父子与土生葡人飞南第家族》,林广志、吕志鹏主编:《卢九家族与华人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民政总署,2011年,第146页;金国平:《孙中山与澳门二题》,《澳门研究》2011年第3期)另外,关于此次相救,葡国学者也指出,飞南第是与“朋友们”一起帮助孙中山脱险的。(参见若昂·哥德斯:《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文化杂志》(澳门)第17期,1993年)

⑥ 卢子骏增修:《新会潮连芦鞭卢氏族谱》卷24《家传谱》,“二十世焯之公”,第21页。

⑦ 据卢怡若回忆,“我们兄弟差不多对革命都有兴趣,我的哥哥和弟弟们都是同盟会的会员,我的四弟还参加了黄花岗之役”。(《旅澳老同盟会会员卢怡若昨来台》,《台湾新生报》(台北)1964年4月9日)

⑧ 卢廉若是近代澳门著名华商领袖之一。他于1913、1919、1921、1923年任镜湖医院总理;1913年1月8日,澳门商会(澳门中华总商会前身)成立,卢廉若被选为值理,另于1915、1916年任第三、四届

(卢廉若)一开始是支持改良派的,但后来革命党人在全国的影响日甚时,他便转而支持革命党人。”^① 1912年5月,孙中山应卢氏兄弟邀请访问澳门,下榻卢家府邸“娱园”。在卢廉若的安排下,澳门中葡各界人士百余人在娱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20日,孙中山还专门与卢廉若、卢怡若兄弟等人在春草堂合影留念。^② 1913年6月20日,孙中山为探望患病的长女孙姪,再次来到澳门,并借机联络国民党的成员和支持者。作为孙中山的“同志”,卢廉若兄弟参与了此次会见,“刚刚组建的国民党是从同盟会脱胎出来的,卢廉若和他的几位家人都是该党的成员”。^③ “二次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涌入澳门避难。1913年10月,广东政府照会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要求澳葡政府协助缉拿陈赓虞、陈席儒、邓铿三人,澳门华务司为此展开调查。澳葡总督为情势所迫,召见卢廉若、卢怡若,查询实情。^④ 卢氏兄弟乃虚与委蛇,搪塞了事,称“不知道他们是否来过澳门……知道陈席儒经常出入人人周知的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中华俱乐部”。实际上,“卢廉若和他的弟弟提供的情况早已是人所周知的,但可以使澳门政府凭此在表面上和广州政府进行合作”。^⑤

卢焯仲,名宗璜,字圣岸,号焯仲。^⑥ 就现有资料看,卢焯仲主要在财务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讨逆战事,军饷甚急,而粤省财政,已成空虚。为此,孙

① 副理,1917、1918年任第五、六届总理,1920、1921、1922年任第八、九、十届总理,1927年任第十五届总理。1918年11月,时任商会总理的卢廉若被任命为澳葡政府政务会议首位华人成员;1925年4月13日,获葡萄牙王室颁授基利斯笃一等十字勋章。卢廉若逝世后,澳门官民于1927年7月31日为之举行盛大葬礼,总督夫妇执紼步送,全城下半旗致哀。在澳门历史上,卢廉若为首位享此礼遇的华人。(参见卢子骏增修:《新会潮连芦鞭卢氏族谱》卷首《肖像》,“二十一世廉若公遗像”;镜湖医院慈善会:《镜湖医院115周年纪念特刊》,第87页;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中华总商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特刊(1913—2003)》,第92页;林广志:《澳门卢氏家族资料四种》,《澳门历史研究》第3期,2003年)

① 若昂·哥德斯:《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文化杂志》(澳门)第17期,1993年。

② 该照片有题记“孙大总统莅澳驻节家园时留纪,民国元年五月二十日卢怡若誌于娱园”。照片为卢怡若孙女卢美颜捐赠,现存澳门特区政府民政总署档案室。按:关于照片中的人物,历来说法不一。张磊等人认为,此为“孙中山在卢园春草堂前门廊与镜湖医院值理合影”;(张磊、盛永华、霍启昌:《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社会舞台》,第228页)汤开建认为,照片左起第一人为胡汉民,第二人为陈炯明,第三人为卢怡若,第四人为飞南第,第五人为孙姪,第六人为孙中山,第七人为陈席儒,第八人为卢兴原,第九人为卢焯仲,第十人为卢廉若。而“以上人物无一人为1911—1912年镜湖医院值理”。(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5卷,第2231页)也有人认为,胡汉民此次“未能随同孙中山访问港澳等地”,而第五人应为孙婉。(余齐昭:《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③ 若昂·哥德斯:《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文化杂志》(澳门)第17期,1993年。按:目前尚未发现卢廉若加入国民党的资料。在1927年7月31日卢廉若的葬礼上,亲历者、葡人 Jaime do Inso 看到,其灵柩上“覆盖着葡萄牙国旗、国民党党旗和赛马俱乐部的旗子”。(Jaime do Inso, *Visões da China*, Lisboa, J. Inso, 1932, p. 89)

④ *Provincia de Macau, Procaratura Administrativa dos Negócios Sinicos, No. 15, Macau, 4 de Outubro de 1913*. 澳门历史档案馆藏。

⑤ 若昂·哥德斯:《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文化杂志》(澳门)第17期,1993年。

⑥ 卢焯仲也是著名华商领袖,他于1917、1918、1925、1927、1928年任镜湖医院总理,另于1935—1939年连续任医院的“管尝值理”;1919年任第七届澳门商会副理。(参见卢子骏增修:《新会潮连芦鞭卢氏族谱》卷首《肖像》,“二十一世焯仲公遗像”;镜湖医院慈善会:《镜湖医院115周年纪念特刊》,第87—88页;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中华总商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特刊(1913—2003)》,第92页)

中山“亲躬理财”，曾发出多份财务“手令”。^①7月3日，孙中山委任冼灿云为驻港筹饷委员，^②7月10日，“电谢海外华侨接济军饷，并请继续支持”，8月1日，“复电海外国民党支部，勉以续助军饷”，^③10月26日，又派邹鲁为驻港特派员，邓泽如为理财员，^④希望“港澳同志”组织“财团”，筹措经费，讨伐陈逆。值此艰难时刻，卢焯仲毅然加入财团，“慨垫巨款”。为此，12月8日，孙中山致函“暄（焯）仲仁兄”：

近得港中同志电告，藉知吾兄以爱国爱乡之志，慨垫巨款加入财团，仁侠高情，佩仰之至！陈逆叛国，遂使百粤沉沦，种种倒行逆施，已天怒而人怨，即其垄断自肥，使吾粤财政枯竭紊乱，四民悉受其影响。港澳同志有鉴于此，组织财团，以图恢复，整理故帑，造福将来，其功甚伟！得兄慨为提倡，尤易有成矣。^⑤

可见，陷于财政困难的孙中山对卢焯仲带头捐款的欣喜以及对他“慨为提倡，尤易有成”的期望。

卢兴原曾留学英国，归国后长期从事司法工作，为我国近代法律界知名人士。^⑥1923年4月29日，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任命卢兴原为总检察厅检察长。^⑦卢兴原上任后，鉴于财政困难，经费无着，曾呈函大本营，请求“将发行状纸状面权划归该厅办理，并将该款拨充厅费”。1924年3月10日，此请获孙中山批准，“事属可行，应予照准。嗣后所有发行状纸、状面，即由该厅办理，该款并准拨充该厅经费，以资维持”。^⑧

与其兄弟比较，卢怡若则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追随者，是澳门早期革命的主要推手之一。卢怡若（1884—1985），名宗缙，字圣惇，号怡若。^⑨怡若年少时，正值孙中山在镜湖行医，因其父卢九的关系，得以认识孙中山。1901年，卢怡若进京应试，曾短暂留京，与改良派人物康有为、恭亲王溥伟交游，“执弟子礼”。回澳门不久，再遇孙中山，即引为知己，“每相过从，旧雨欣逢，谈心永夕”。孙中山鼓动卢怡若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财力，参与“匡国”伟业。他对卢怡若说：“吾子饶于资，当效卜式输财而匡国；吾子博于学，奚让伍员偃蹇而后吴？抑吾子以异族功名为显，亲王门生以为荣哉？吾子卓犖奇伟，若壮其志于伟大，则汉人之所望也。其有意于斯乎？”经过动员，卢怡若“革命之思想，以是油然而兴矣”。

① 《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叛变，经济拮据，孙中山亲躬理财的手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插图。

② 吴伦霓霞、陈胜莽等编：《孙中山在港澳与海外活动史迹》，第79页。

③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年谱》，第296—297页。

④ 《致邓泽如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95页。

⑤ 此函未见收录于任何一种孙中山文集和史料集。原件藏于香港卢衍民（卢焯仲之孙）家中，广东省江门市华侨博物馆存有复制件。此函复印件为卢九家乡——新会潮连街道办退休干部卢炳荣于2011年1月赠予笔者，特此致谢！另外，此函未署年份，笔者曾于2011年9月19日执此函复印件向张磊请教。张先生认为，1922年7月之后孙中山讨伐陈炯明，经费“最为紧张”，此函应写于1922年12月8日，时孙中山已离穗赴上海。

⑥ 卢兴原，字圣步，号孔勉。曾游学英伦，获法学硕士学位，考取英国大律师资格。回国后历任外交部司长、大理院庭长兼平政院庭长、广东高等审判厅厅长、上海临时法院院长等职。（卢子骏增修：《新会潮连芦鞭卢氏族谱》卷首《肖像》，“二十一世孙兴原肖像”）

⑦ 《任命卢兴原职务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13页。

⑧ 《给卢兴原的指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82—583页。

⑨ 卢子骏增修：《新会潮连芦鞭卢氏族谱》卷17下《宗支谱》，“宗缙”，第24页。

1902年，卢怡若便“衣洋服，剪辫子”。未几，留学日本，在横滨加入同盟会，“卢公列党之后，闻于海外各地。时陈少白主笔政于香港《中国日报》，少白为文布道之”。^① 1905年9月，冯自由、李自重受孙中山委托，赴澳门“联络同志”。^② 1909年冬，同盟会澳门分会成立，卢怡若为主要负责人之一。^③ 为避开清政府耳目，同盟会“不能不秘密行动”，而活动经费则由卢怡若负担，“每相约至黑沙湾最僻之地举行会议，一切组织费用，皆负于卢公”。^④ 1909年，该会“首见于行动者”，为创建“华服剪发会”。该会成立时，租清平戏院为会场，广邀中外人士出席，卢怡若为大会主席，“于演辞中鼓励华服剪发之外，并从中申述革命救国，以唤醒人心”，与会者多“垂辫而入，持辫而出”。^⑤ 1911年7月，为了寻求固定的活动场所，卢怡若等人租下白马行街一大屋二楼，与林君复、萧僊一联名向澳葡政府申请成立“濠镜公众阅书报社”，^⑥ 29日，获澳葡政府批准。^⑦ 该社“开幕”之日，澳门为之轰动，“港中琳琅幻境白话戏班闻之，特愿为之演剧一宵助庆……印送票至三千余之多”，当晚，清平戏院“人声鼎沸，几乎闹事”。此外，“更有在轮船卖药者几人演说革命”。^⑧ 表面上，该书报社为一公开的图书馆，其实为同盟会“半公开的机关”，里面陈列了许多策动革命的书报“以为鼓吹”，“并为同盟会所，卢公主盟于此，杨振熊等于此时先后加盟”。^⑨ 据赵连城回忆，“在谢英伯策划下，同盟会在澳门开始发展组

- ① 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按：卢怡若于1967年填写的《中国国民党老党员生活补助党员特别借助申请表》，自称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五日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党证字号”为“香字23098”。此时同盟会尚未成立，恐系卢氏误记。该表由卢怡若后人捐献，现存澳门特区政府民政总署档案室。
- ② 《给冯自由李自重的委任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6页。
- ③ 张磊、盛永华、霍启昌：《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社会舞台》，第199页。按：据赵连城回忆，“澳门同盟会支部的工作当时是接受香港方面领导的。澳门的主盟人初由谢英伯兼任，谢一度奉派去檀香山，乃改由‘香军’参谋林君复继任主盟人。当时支部的主要负责人还有刘公裕、卢怡若、陈峰海、刘卓凡、陈卓平、林了依、梁倚神、刘大同等”。（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参加革命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2页）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既与卢怡若引为知己，可能也曾属意卢怡若组建澳门同盟会：“既而中山先生授命与卢公及林君复、邓三伯、谢英伯等，组织同盟会于澳门，为策动革命之机构。”（参见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
- ④ 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
- ⑤ 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按：关于此次活动，据赵连城回忆，“那时同盟会已开始澳门发展组织，当地已故著名富商卢九的第三子卢怡若（又名新仔）、工程师刘公裕、牙医刘大同、国民兴书局司理邓继明等都先后参加了同盟会。在这些社会上层人士的号召下，‘澳门华服剪辫会’在当时最大的戏院——清平大戏院举行一次群众性大会，到会人数约达千人，已剪去辫发的人都穿着华服到会作为示范”。（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参加革命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90页）
- ⑥ 禀文如下：“具禀绅士卢宗缙等，为组织公众阅书报社，拟定章程，禀乞恩准存案。事切绅等，悯本澳华侨缺乏教育，殊有碍于世界之进化。爰约集本澳各热心家，担任经费，仿照各国办法，创立一公众阅书报社，备购大西洋及各国书籍报纸，任人入内观览，不收费。此既可补教育之不及，即所以助世界之文明。惟绅等托庇于下，凡结集社会，理合将办法详陈，以崇法律，而昭正大。兹谨将社内章程附列于后，禀乞督宪大人恩准施行，绅等幸甚。”澳葡政府民政厅档案：“由卢宗缙等人建立的公共图书馆——濠镜（公）众阅书报社章程”（*Estatutos da Biblioteca Pública-Hou Kiang Chong Iut Su Pou Sié-Fundada por Lu Chong Chan e Outros*），1911/7/12—1911/7/22. AH/AC/03169，澳门历史档案馆藏。
- ⑦ 《澳门宪报》1911年7月29日，第30号。
- ⑧ 《志士之志》，《华字日报》（香港）1911年8月14日，第3版。
- ⑨ 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

织，在南环四十一号秘密设立了同盟会支部的机关，同时还参照当时同盟会在海外工作习惯采用的‘书报社’形式（香港设有‘民生书报社’），在白马行街钓鱼台的一座三层大楼成立了‘濠镜公众阅书报社’（澳门旧称濠镜）。该社由卢怡若以绅商资格取得澳门葡政府批准立案，并向各界发动募款捐书，以供群众借阅”。书报社成立后，立即在青年学生中发展会员，培基学堂学生赵连城、古桂芬、冯秋雪、冯印雪、区韶凤、何国材、周树勋等七人首先加入同盟会。^①

民国元年，孙中山邀请卢怡若至南京共商国是，并委之为总统府顾问，后任总统府筹饷委员，与孙中山之兄孙眉南下筹饷。时胡汉民为广东都督，军政费用紧绌，乃与港澳同志商量，决定在港澳筹款，以应急需。卢怡若遂与陈少白、杨西岩、陈席儒、陈赓虞、容星桥等人“筹得巨款，雇专轮载以赴省”。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卢怡若“眷念故人，邀之来澳”。在澳门期间，孙中山对民国前景不无忧虑，认为袁世凯“今居总统之位，岂诚意匡民救国乎？未始不为忧也”。有虑及此，孙决定派一位可信之人进入袁世凯政府，“从事窥袁之举止，以联络革命同志”，此乃“策之善者也”，而卢怡若则为最佳人选。孙中山将此意告知卢怡若，并极力向袁世凯推荐。不过，卢怡若出于多方面考虑，“未就”。^②孙中山此次在澳门短住，与卢怡若多次晤谈国事，互道珍重。现存的一张旧照片，见证了他们之间的情谊：孙中山抵澳不久，将一帧半身照片题赠卢怡若，照片右上方题“怡若先生惠存”，左下方落款“孙文持赠”。^③

孙中山逝世后，卢怡若仍与其居澳亲属保持密切联系，一直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1952年9月，孙中山元配卢慕贞在澳门逝世，其孙治平、治强等从香港赴澳门奔丧。关于卢慕贞葬于何处为妥，一众亲友以及治丧委员会议而不决。卢怡若认为，卢慕贞久居澳门，也应该葬在澳门，“澳门虽属葡治，亦当画地以奉安”。可是，在西洋坟场安葬的华人，通常为已入葡籍的人士。为此，卢怡若亲赴澳葡政府华务司陈说，并拜见澳督史伯泰（Joaquim Marques Esparteiro），详述卢慕贞应该葬在澳门的理由，史伯泰为之感动，立即决定划地相赠。9月10日，卢慕贞得以安葬在旧西洋坟场。^④

五、结 语

孙中山在镜湖及中西药局行医坐诊，乃至在澳门的一切活动，均与华商有着密切关系，得到华商的支持和帮助。孙中山最初对支持他“悬壶济世”的华商曹有、曹善业、卢九、何连旺、吴节薇等人抱有很大期望，但这些华商对其政治理想缺乏兴趣，孙难以找到政治运动的“热心同志”，加之受到葡医、中医的排挤与忌妒，最终离开了澳门。这一过程，使孙“早认澳门一地不能为政治之运动，乃乘机收束中西药局而移于广州”。^⑤即使如此，多年以后，孙对曾在医务上给予他大力支持的“澳门中国医局之华董”仍然心存感激。华商方面，其心态也颇为复杂。首先，卢九、何连旺、曹善业等人热衷于华人慈善事业，对“立竿见影”的西医颇为热衷，对“华人而业西医”，且医术高明，义务诊症的孙中山大表欢迎，积极推介；其次，何、卢、曹等

① 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参加革命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91页。

② 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

③ 照片背面题“到澳不久赠卢相片”，是否为孙中山手迹，待考。该照片为卢怡若孙女卢美颜捐赠，现存澳门特区政府民政总署档案室。

④ 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

⑤ 《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73页。

人拥有贵财，捐有官衔，深得清政府“眷顾”，在政治上比较保守，对孙以改造中国为目标的政治言论“心有疑虑”，反应冷淡。但当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遭遇危险时，卢九等人毅然伸出援手，暗中给予同情与帮助。辛亥革命后，与其父辈的“顽固”、“冷漠”不同，以卢廉若兄弟为代表的新一代华商对孙的革命伟业有了新的认识，逐渐转变为革命的“热心同志”，他们出钱出力，甚至加入同盟会或国民党，公开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这种曲折关系和复杂心态，真实地反映了清末民初澳门华人社会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对革命浪潮“甫见开通”的情形。

孙中山在澳门的医务实践及其政治活动，给澳门华人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呢？笔者认为，孙早期在澳门的活动，无疑给镜湖医院乃至澳门华人社会带来了另一种意义的“革命”：一方面，孙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①他所鼓吹的“改造中国”的“政治言论”，对卢廉若、卢煊仲、卢怡若等新一代华商以及杨振熊、赵连城、古桂芬等华人青年转向支持或参与革命产生直接影响。他离开澳门后所从事的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以及中国内地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则将澳门华人的政治视野带至更广阔的天地，尤其是更加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1911年12月，广东军政府派员到澳门筹饷，澳门华人“人人争先”，踊跃捐款。13日，手车行商人刊登布告，“情愿将五天内所得之车费，除各人伙食外，尽数帮助军饷”，“以尽国民之责”，并且盼望“大功告成，光复祖国”，其“爱国之心”，于此可见。^②另一方面，孙中山在澳门的医务实践，推动了西医在澳门的传播和普及，启动了镜湖医院向医疗现代化的转型。孙中山离开澳门后，卢怡若自解私囊，聘请西医廖德山在镜湖驻诊，“赠医施药于社会卫生”；^③辛亥革命前后，时任澳葡总督马楂度（Álvaro de Melo Machado）发现，“通常而言，华人不接受西医和西式疗法，但最近以来，某些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华人，也开始利用葡萄牙的科学治疗方法”。^④在这些华人的带动下，西医西药在华人社会逐渐兴盛起来。民国初年，卢怡若发起组织“西法接生会”，请女西医余美德主持医务，“自兹而往，产妇婴儿之伤亡日减”。^⑤镜湖医院于“一九一九年兴建留医所（C座大楼），一九二一年倡设保婴部。自此以后，西医西药逐渐发展，为西法治病之需。一九二三年更倡办护士助产学校，中医中药最后在一九四四年结束”。^⑥可见，孙中山早期在澳门的活动之于镜湖医院的发展乃至澳门华人社会的开放，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附识：本文的写作和修订，吸纳了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并得到张磊、汤开建、金国平、刘泽生、王杰、莫世祥、陈志雄等先生的指导和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林广志，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兼学术总监〕

（责任编辑：雷家琼 责任编辑：李红岩）

① 《伦敦被难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页。

② 《澳车夫助军饷布告》，《华字日报》（香港）1911年12月13日，第3版。

③ 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

④ Álvaro de Melo Machado, *Coisas de Macau*, 2.ª edição, Macau: KAZUMBI-Editora Multimédia Lda., 1997, p.125. 按：马楂度于1910年12月17日至1912年7月14日任澳葡总督。（参见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二十世纪）》，金国平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年，第314页）

⑤ 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

⑥ 梁秀珍：《镜湖医院115周年回顾》，镜湖医院慈善会：《镜湖医院115周年纪念特刊》，第47页。

double-character names reflecting upper class concepts in turn influenced the names taken by the lower levels of society. Underlying the changes in the single- and double-character names of southerners during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is the continuous influence of Huaxia culture on southern society.

From “a Town Named after Temples” to “a Town That Grew Out of Temples”: The History of the Layout of Three Ancient Temples and the Settlement in Nanxiang Town Wu Tao (54)

Ever since it was first settled, Nanxiang Town has had an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with its temples and monasteries. Over a long period of constant accumulation, layer upon layer, during 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town’s history has been traced back by the local people to the Liang dynasty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period, completing the shaping from “a town that was named after the temple” to “a town that grew out of the temple.” The above process w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market development and the expansion of towns and settlements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The Nanxiang Temple, as the largest of the “three ancient temples” in Nanxiang Town, not only took part in and witness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Nanxiang Town from its birth to its increasing prosperity but also grew from a mere religious center into an important place incorporating the religious, commercial and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However, temples were not the dominant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market development; the emergence and growth of Nanxiang Town was a result of interactions of multiple factors of space, system, commerce and trade, and culture.

Macau Chinese Businessmen and Sun Yat-sen’s Medical Practice and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Lin Guangzhi (71)

Dr Sun Yat-sen’s early activities in Macau, including his entering the Kiang Wu Hospital, opening pharmacies and promoting Western medicine, and even his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were all closely related to Macau’s Chinese businessmen. Because of the exclusion and jealousy of both Portuguese and Chinese doctors, and because of his failure to find “enthusiastic comrades” for his political movement among Chinese businessmen, Sun regretfully left Macau in early 1894.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men in Macau, represented by Lou Lim Lok and his brothers, gaine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Dr. Sun’s great revolutionary cause and provided both their money and their efforts. They even joined the United League of China or KMT, and thus gradually became the “enthusiastic comrades” of the revolution. Sun Yat-sen’s early activities in Macau promoted the openness and progress of Macau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A Review of KMT Party Cells (1924–1949)

Xu Xiuli (88)

From the very early days of its re-organization, the Kuomintang (KMT) began to set up secret KMT cells in non-party organizations. These were subject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ir respective headquarters. The functions of the cells were to implement the KMT’s doctrines, consolidate their own positions, win over sympathizers, attack dissenting views, absorb new members, etc., with the aim of controlling and guiding non-party activities and mass organizations. During the first Kuomintang-Communist cooperation, these cells focused on student organizations and the army. In the period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their focus was on mass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 opinion institutions.” The initial purpose of setting up the cells was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but the main goal soon changed to contest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mass movement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focus sharpened in the later period. Party cells had a long existence in the KMT and gained much attention from top leaders. Seen in this light, they reveal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the KMT’s ideology.

The Ambivalent Attitude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toward the Papacy: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anons and Decrees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Chen Wenhai (106)

The Council of Trent was a series of far-reaching meetings called by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mid-sixteenth century in response to the Protestant challenge. Given the situation at the time, the widely reviled institution of the papacy and its entrenched evils should have been among